

郑观应的启蒙教育思想述论

徐启彤

郑观应(1842—1922年)是我国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,是早期维新思想的集大成者。郑观应在经济上要求发展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,政治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,这些思想均有典型意义,学术界论者颇多,而郑观应的教育思想却论者寥寥。其实,郑观应的启蒙教育思想很典型,且在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。为此,本文拟作些简略探讨。

一、“中学其本也,西学其末也”

郑观应在《盛世危言》的《西学》篇中,提出“中学其本也,西学其末也,主以中学,辅以西学”的教育思想纲领,认为只要以这一思想为指导,教育便可收到“知其缓急,审其变通,操纵刚柔,洞达政体”的教育效果。郑观应借用我国古代的“道器”观中的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”的论题,阐发为“道为本,器为末”(《盛世危言·道器》下文凡引《盛世危言》或《盛世危言后编》的,仅注篇名)。郑观应将中学比之为“道”,将西学比之为“器”,认为“道”是根本,“器”是从属,这样中西学就存在着主次关系。这实际上是继承了洋务派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思想。当然,在西学东渐的潮流冲击下,西学显示了它巨大的社会作用,于是他便认为“器”是不可忽视的:“非举小不足以见大,非践迹不足以穷神”(《道器》),主张“道”需要通过“器”来体现和发扬光大。这是郑观应对洋务派中西体用观的发展。同时,他对所主张采用的西方之“器”的内涵也扩大了,已不像洋务派主张的那样,仅仅包括坚船利炮、科学技术,而比洋务派的认识广泛得多,除了科学技术更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教育制度的仿效。随着社会认识的提高,郑观应教育思想中的西学地位有了显著的增长,教育主张则以建立新型学校、培养通晓西学人才为中心。

出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,郑观应在政治、经济上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制度,迫切需要“皆肆力于有用之学”(《考试》)的人才。他认为“循空文而高谈性理”的封建教育,是不切实用的虚玄之学,而西学才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“实学”,才是医治国家“危疾”的良方。于是,他主张改变封建教育,发展西学教育,培养实用人才,从而把仿效西方教育制度的主张引向深入。

他在对待中西学关系问题上,虽看到了西学的作用,也意识到中学、西学的矛盾和对立,然而他没有否定传统中学,对中西学的对立作了别出心裁的融合:“不知虚中有实,实者道也;实中有虚,虚者器也。”(《道器》)这就是说中西学虽然存在着本末、虚实、主辅的对立关系,但两者是互有虚实,互相渗透,互为补充的,认为“合而言之,本末兼赅,分之则分卷无具”。(《道器》)在他的教育论著中甚至更明确提出:“融会中西之学,贯通中西之理”(《西学》附录),这是对中西学关系的重大发展,似有力主张改变腐朽封建教育制度,主张中西教育融会贯通,融中西教育为一体之倾向。这说明他已模糊地认识到,引进西方教育,必须结合我国国情,只有中西教育的结合才能发挥其社会作用。当然,他的这些中西融合的教育思想还是初步的,在他一生的教育思想中,突出的还是改变陈旧的教育,仿效西方教育制度,建立新式学校,充实西学教育内容,培养科学技术人才。

二、“学校者,造就人才之地”

郑观应的教育思想,反映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富强救国的理想以及对实用人才的需求。“学校者,造就人才之地,治天下之大本也。”(《学校》)他把人才看作治理国家之根本所在。他认为我国与西方富强各国的差距就在于学校教育:“学校者,人才所由出,人才者,国势所由强,故泰西之强,强于学,非强于人也。”(《西学》)他对自强、人才、学校的关系还作过十分清楚的阐述:“自强之道,以作育人才为本;求才之道,以设学堂为先”。(《学校》附论)这就清楚地说明了,要使国家富强,就得重视新型人才的培养,而新型人才的培养,当务之急又必须重视新型教育。

为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,郑观应的教育思想还反映在他主张造就新型人才,与外国资本主义进行“商战”的战略主张上。他认为“商战”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盛衰,而“商战人才,无一非出自教育。教育为立国之本,国运之盛衰系之,国步之消长视之。”(《致伍秩庸先生书》)他对培养新型人材的作用,有了充分的认识,主张要振兴我国民族工商业,“必先设立机器、技艺、格致书院以育人材。”(《商务》)

郑观应的教育思想还反映在他建议普及教育,广设学校,作为培养人才重要途径的教育主张上。他在介绍西方教育时认为,英、德、法、美诸邦崛起近世,就是由于“庠序学校,遍布国中,人无贵贱,皆有所教。”(《教养》)他认为德国教育规制最为完备,无论贵贱男女,五岁皆须入学,如有不入学者则要问罪其父母,而该国书院之盛,为欧洲之最。“盖其国之制,无地无学,无事非学,无人不学,”于是乎“人才辈出,方兴未艾。”(《学校》附论)对此,他颇有感慨地说:“读书则智,不读书则愚;智则强,愚则弱”,“富强之基,在于学问”。对德、美、英法等国实行普及教育,富强如此之速,大加赞赏;而对“阿洲之民未闻读书,宜其全洲为各国所分裂也。”(《西学》附录)感到十分痛惜。可见其对普及教育的意义认识是很深刻的。他的普及教育、广设学校以培养人才的教育思想,对我国近代教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。

郑观应还主张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,发展专业教育,以适应我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。这一教育思想主要受世界资本主义教育规制的影响。他认为,欧洲各国讲究教育之道,一切学问无不设立专业学堂,诸如,仕学院、医学院、技艺院、格致院、船政院、通商院、农政院、师道院、武学院等等。他认为这样学生既可以学有专长,学以致用,又可为国家培养各种专业知识人才。他还详细地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,各类学校星罗棋布、不可胜计的情况。他说,日本仿照泰西教育之道、专门学校林立,以培养专业人才,“居然国势振兴,我国胡(何)不亟力行之”。(《学校》附论)于是,他建议我国学校教育应“各分各科,人得以就其质之所近,专习一业。”(《考试》)这样学生便可获得实用之学,以便今后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,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。他在充分认识专门教育对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材,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均有重要作用的基础上,大声疾呼:“国之盛衰系乎人,然则中国今日所以力图自强,不至借材异域,其可不讲求造就人才之道乎哉”。(《学校》附论)振兴中华、造就各种专门人才的爱国之心十分鲜明!

郑观应在主张建立新型学校、广泛培养新式人才的同时,对封建科举制度的腐败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。他认为旧教育所学的所谓圣人之书,圣人之道,“实则蠢愚迂谬不可响迹,腹笥空虚言无所得”,读书六、七年“不辨菽麦”(《学校》),毫无实际意义。即或学成,也只得“尽弃所学”,造成“所学非所用,所用非所学”(《考试》),实在是埋没了中华民族的广大人材,坐待民族危亡,后果是十分严重的。

鉴于科举制度的腐败,郑观应极力主张改革科举、废除八股,断言如果“文试不废时文,武

试不废弓矢”，“以此而言富强，是欲南辕而北辙耳”，只有多设科目，“以萃人才，则天下之士，皆肆力于有用之学矣”，认为录用人才应“论其艺而不论其文，量其才而不拘资格，精其选而不必定额。”（《考试》）他主张采用这种注重真才实学的选才方针，以鼓励人们追求有用之学。他还把废八股、改科举与授西学、兴学校联系在一起。他阐述两者关系是：“不修学校，则人才不出，不废帖括，则学校虽立，亦有虚名而无实际也。”（《学校》附论）他积极主张借鉴西方教育之程式，兴建新式学校，设置西学课程，以广植人材。

三、“仿照泰西程式”

郑观应在批判封建教育制度的基础上，主张对旧有学制进行改革和补充。他对建立新式学校十分重视，在详细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校的规制以后，主张我国学制应“仿照泰西程式，稍加变通。”（《考试》）他提出，文武学校各分大、中、小三等，各乡设立公塾，各州县设小学，各府省会设中学，京师设大学。文科学校再分六科：即文学科、政事科、言语科、格致科、艺学科、杂学科。武科学校则分两科：即陆军科、海军科。每科均分班授课，定期考核，以决定升降。并延聘精通中西学的学者，作为学校中的教习，大、中、小学均为三年学期，在授完课程后，选拔优秀者升入高一级学校。他认为泰西各国按此种教学程式富国强盛，“我亦趋其后，较易成功，……不及十年，中国人才，无难与泰西相颉颃，”（《考试》）

对于传授西学所含范围的理解，郑观应也是不断加深的。他在《易言》中将西学分为经学、法学、智学、医学。他在《盛世危言》中则将西学分成天学、地学、人学，其内容当已包括自然科学、工艺技术，以及政治、经济、社会，刑法、军事等方面，这就超过了洋务派和当时一般人对西学的狭隘理解。他认为中国新型学校教育必须从重时文，而变为重西学的传授。

在西学教育中，除广泛传授外，他极力提倡以自然科学作为主要教学内容，认为：“学校者人才之本，格致者学问之本”，格致之学可以“穷天地之万机，阐万物之元理”（《教养》），是西学中最重要之学问。他把西方各国近代的迅速发展归结为“讲求格致之学尤推独步”（《西学》附录）。于是，他顺理成章地得出我国如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商业，“必先通格致、精制造”（《商务》）的思想。他认为格致之学虽派别条分，头绪纷繁，然而，“皆导其源于汽学、光学、化学、电学，以操御水、御火、御风、御电之权衡”（《西学》），具有改造自然、改造社会之功能，对自然科学的巨大理论指导作用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。他非但主张新型学校教学应以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，“格致、制造等学为其本也，语言文字为其末也”，同时还主张学校考试也以格致、化学、电学、重学、矿学等课程内容最为重要。

在教学方法上，他主张应循序渐进，由浅入深，不能急躁冒进。他说：“读书之功亦循序而进，譬诸自地登楼”，还比喻说：“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，九层之台，起于垒土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”他认为学习必须从头开始，不断积累，反对越级跳等，主张“授学伊始，易知易能，不以粗浅为羞，反以躐等为戒。”（《西学》）他介绍西方的教学方法：“大小书院所习课程，自各国语言文字、天文、地理、兵法、制造、算学、绘图、机器等学，无不因材施教，循序渐进，由小成以底于大成。”（《学校》附论）这种教学方法，既符合教学的客观规律，又适应学生的心理发展，可以使“人之灵明日启，智慧日积，而人材济济，国势以强也。”

郑观应主张学校教育要注重实效，学和用要紧密联系。他在介绍西方教育体制时说：“泰西各国学校规制，虽互有同异，然其精益求精，蒸蒸日上……一切讲求实效。”他对这种注重实效的教学方法颇为赞赏，主张我国教育应极力仿行之。他曾主张工厂办学校，厂校结合，倡导“就

局厂之机器,可即事以指授”(《拟设钢铁冶炼学堂说帖》)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,甚至还主张“寓生计于教育之中”。(《招商局公学开学训词》)

郑观应主张仿照西方教育程式,重视西学的传授,以及培养新型人才,这些都是符合历史潮流的,是进步的。他认为国家富强,取决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,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,又取决于科技人才的培养。郑观应把学校教育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机的联系起来,主张学校教育要培养“坐而言者,即可起而行”的实学人才,从而使其教育思想独具特色。他还主张学校教育应以自然科学为主,以格致之学为要,说明他更重视科学理论对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指导作用。

郑观应非但有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,而且还身体力行发展新型教育事业。他曾于厂矿企业结合实际办学,以发展经济。如1896—1897年,他在汉阳铁厂担任总办期间,该厂技术人员严重缺乏,只得大量聘用外国技师。郑观应积极建议铁厂办机器学堂,以迅速培养人才,逐渐“替代洋匠”。又如辛亥革命后,郑观应在担任轮船招商局董事期间,曾兼任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,以及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,主张大力造就航务人材,“为我航业放一异彩”。认为招商局设学,是“为我公学造人材,即为国家造人材,非特我局之幸,亦为国家之光。”(《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公宴校长诸君颂辞》)足见他对培养实学人材,包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,有其高瞻远瞩的思考。

郑观应尽管在教育论著中,突出仿效西方教育制度、建立新型学校和培养实学人才的教育主张,但他不同意“震惊他人之强盛而推崇过当”,反对把西学教育推崇到不恰当的地步,而主张对中西学教育采取“不薄待他人,亦不至震慑他人;不务己长,亦不敢回护己短”(《西学》),要看到彼此的利弊长短,实事求是地接受西方教育。这种既主张批判旧教育;又不完全否定;既主张吸收西学,又不全盘照搬的教育思想,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。郑观应提出的“融会中西之学,贯通中西之理”,以及“以西学化为中学”的教育主张,更是为近代中西学教育的融合起了先声作用。

出于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,郑观应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。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,为救亡图存、振兴中华,他将根本出发点集中在学校教育上,显然是片面的。就是他所提倡的教育,也不可能以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去取代封建主义教育体系,不可能突破封建纲常名教的束缚。他虽然高度重视建立新式学校以学习西学,但仍然把中学说成是“道”、“本”、“主”,把西学说成是“器”、“末”、“辅”;虽然主张学校教育应以传授西方自然科学为主,但又认为学习西学是“以中国本有之学,还之于中国”;虽有融合中西教育之倾向,然而不可能真正做到去其糟粕,融合精华。同时,由于对西方教育缺乏全面、深刻的了解,其学习西方的教育主张,往往又流于照抄西方教育的模式。

郑观应后期随着政治愿望的失败,政治思想出现了倒退,教育思想也同样显得保守和落后,对西学教育产生排外的心理,而有所贬低,对中学教育则突出其封建主义的一面。当时潮流迅猛向前发展的时候,他的教育思想反而倒退了,这是令人遗憾的。

[责任编辑 黄新宪]